

筚路维艰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Five Choices on the Road to Chinese Socialism

萧冬连／著



社会 科学 文献 出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HARD STEPS

筚路维艰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Five Choices on the Road to Chinese Socialism

萧冬连／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萧冬连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0

ISBN 978 - 7 - 5097 - 6324 - 7

I . ①筚… II . ①萧…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8760 号

筚路维艰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著 者 / 萧冬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编辑 / 宋荣欣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5.75 字 数：225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324 - 7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实行新民主主义 / 5

- 一 “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 6
- 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建国构想 / 10
- 三 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行 / 14
- 四 理想与政策之间的张力 / 20
- 五 酝酿放弃新民主主义 / 28

第二章 仿效苏联模式 / 34

- 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 / 34
- 二 统购统销的深远影响 / 41
- 三 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 49
- 四 “举国体制”的形成 / 62

第三章 追寻赶超之路 / 73

- 一 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 / 73
- 二 1957年的“大转弯” / 82
- 三 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 92
- 四 滑向大饥荒 / 104
- 五 思想和体制透视 / 118

第四章 动继续革命	/ 123
一 危机下的退却与分歧	/ 123
二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 138
三 文化大革命何以发动	/ 148
四 暴力、派性与权力斗争	/ 158
五 恢复秩序与维护“文革”	/ 168
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	/ 175
一 中国改革的缘起	/ 175
二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 187
三 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 202
附 录	/ 215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艰难转向	王海光 / 216
关注当今和未来社会的主要矛盾	陈东林 / 225
历史的逻辑反映历史的继承性	李向前 / 229
历次转向都有国际背景的影响	牛大勇 / 235
用人性和常识理解中国改革的初始动力	韩 钢 / 238
路径选择受多重因素制约	章百家 / 241

前 言

本书拟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做一个逻辑梳理。我认为，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这五次选择呈现两个过程，即从走入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本书试图说明以下问题：中共何以放弃原本认真考虑过的新民主主义，急于仿照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觉察苏联模式弊端并尝试走中国自己的路之后，为什么引导出一场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标志的乌托邦运动？对“大跃进”的调整和反思，为什么又走上了“文化大革命”^①的不归之路？“文革”结束后，又是哪些社会力量推动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1953年为什么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政策？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和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新民主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变通的理论，一种阶段性的制度安排。在毛泽东那里，相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切都是过程，都具有策略性。这是决定毛泽东取舍新民主主义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具体说，有三个因素促使新民主主义政策很快地结束了：第一，就是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担忧。特别是在

^① 为行文方便，以下不再加引号。

农村，各级领导担心，假如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靠个人发家致富了，他就不会向往社会主义了，党在农村的力量就可能发生动摇。第二，就是力量对比的变化，或者说对力量对比的估计。1952年土改以后，可以说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对新政权提出挑战。在经济结构上，国家不仅已经控制了经济命脉，国有工商业所占比重也超过了私人工商业，私人企业的一半以上也已经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国家有力量对它实现和平改造。第三，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并在经济改革与扩大民主两方面进行了尝试。然而，这种探索被一场来自外部的危机——波匈事件和国内的一场反右派运动所打断，从扩大民主转向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不过从1956年到1958年，在一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强烈的赶超冲动。如果要找一个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模式，那就只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它具有双重赶超的含义：一是用全民动员的办法创造增长奇迹，赶超英美；一是通过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苏联，建立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模式。“大跃进”是政治压力与政治激情的双轮驱动。政治压力来自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及1958年党内批评反冒进等一系列反右倾斗争。用“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搞经济建设，造成了从上到下的紧张气氛，压制了党内外的不同意见。政治激情来自于“强国梦”愿望与乌托邦理想，党的高层几乎没有头脑不发热的，各级干部急于建功，敢于冒险，许多想法和做法出自他们的“发明创造”，“大跃进”的失控显露出运动式经济的巨大风险，“大跃进”滑向大饥荒与一些基本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关系。

1960年代初从对“大跃进”的反思和调整为什么转向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轨道，这与两件大事有关：一是“大跃进”失败引出的党内分歧，一是冷战背景下的中苏分裂。从意识形态考察，这两件事都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党内分歧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在大饥荒面前，党内许多高层领导干部已经从 1958 年那种狂热情绪中冷静下来，回归到常识理性：社会主义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基于这种意识，许多人认为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包括包产到户，虽然只是权宜之计。这越出了毛泽东所允许的底线。毛泽东认为一些人在暂时困难面前发生了政治动摇，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治倾向，必须站出来进行强力干预。中苏分裂有很多原因，但不可忽视意识形态因素。中国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批评中国是教条主义，实质上是经典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改革的一次激辩。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身上，当然前提是中共自己不变修，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是符合逻辑的延伸。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肯定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他要清理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一个阶层，一个派别，要改造整个党；“文革”也是一场社会大试验，在这一点上与“大跃进”一脉相承，只是路径不同，“大跃进”以经济为进路，“文革”是以政治和思想为进路；“文革”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文革”以反修防修相号召，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反对，中共高层没有也不可能形成阻止“文革”发生的力量。如此多的民众带着宗教式狂热投身于运动，反映出群众对官僚特权化的不满和对革新社会制度充满幻想，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的主流是“奉命造反”而不是“趁机造反”。文化大革命这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三个东西，一是普遍的暴力，一是持续的派性斗争和动乱，一是诡谲的党内权力斗争，使“文革”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文革”培养了反“文革”力量。

1970 年代末，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启动，肯定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文革”带来的后果有两个：一是伤人太多，把所有阶层，特别是过去的既得利益阶层都伤害了，谁都不愿意再回到“文革”。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很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就促使了党内和知识界对于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一种深刻的反思。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主要有三种力量，一是重新出山的老

干部。从希望摆脱“文革”噩梦这点上看，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是改革派，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党内没有基本的改革共识，改革就很难推动。当然不是所有老干部都始终一贯支持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引起了持续的争论。但是从中央到省市、到地县，各级领导层确实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领导人。第二种力量是知识分子。1980年代知识分子都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历次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创伤，更主要的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目标激起了知识界的热情。还有一个改革力量来自基层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农民很难说认识到他们选择包产到户与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是农民的选择确实成就了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走这么远，有一个大背景，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的。开放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又推动了改革。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在引进外部资金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观念、规则和制度。当然，中国决策层始终坚持了自主选择的原则，没有接受任何“一揽子”方案，不是依据某种理论逻辑而是诉诸“试错”式改革实践。

当今中国，对于当代中国史的看法分歧很大，尤其网络上两极化的说法俯拾即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应当避免为某种主观情绪所左右，把追寻真相作为自己的任务。追寻真相不等于一切都“反着看”“倒着看”，最后的判断只能是依据事实。研究历史，首先应弄清“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本书的学术态度是：力求每一判断都立于可靠坚实的材料之上，收敛过度解读的冲动，对历史的复杂性抱持一种敬畏；着重于发掘历史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做简单的道德和价值评判，拒绝用某种既成框架来框定历史。本书的考察自然要涉及领袖人物的意志和党内分歧，但更注重于分析在个人意志和党内分歧背后起作用的历史的、制度的和观念的因素。通过这种梳理，为人们思考中国未来走向提供某种历史经验的支持。

第一章 | 实行新民主主义

在相当长时间内，人们避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有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并曾付诸实行；在论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只谈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极少论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原因很简单，1953年，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随后，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实在太短促。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发现，现在许多做法，包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给予私人企业以合法地位，正是当年新民主主义要做的事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决策者不可能采用“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的说法，而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改革提供依据。但在一些高层官员内心，并非没有“社会主义搞早了”的想法。1985年6月，姚依林曾私下说过：“从今天回头看，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否应该长一些？……现在许多事情都是返回去做，为什么那时不就这样做呢？”^①薄一波在回顾历史事件时写道：“如果土改后不急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不立即动摇私有制，而是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那样，不仅对生产力的发展可能更有利些，而且也可能不至于搞成后来那样千篇一律的农业集体化模式”。^②赵紫阳退位后，在私下谈话中也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但革命后马上“搞社会主义，这一点，错了。

^① 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第298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06页。

现在才又搞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这是不得不做的”。^① 胡绳、于光远、杜润生、李锐等中共党内一些理论权威人士也推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认为它是一种独具创造性的社会理论，对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不无惋惜。^②

不过，这是几十年后得到的认识。支配历史进程的是当时人，尤其是最高决策层的普遍观念。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当年毛泽东等人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过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社会主义在彼岸，新民主主义“在桥上”。由于理论本身的双重性质和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新民主主义政策很难持久，提早结束反而符合其自身逻辑，无论这种选择对以后的发展是否有利。这里说的不是所谓“历史必然性”，而是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内在张力及其发展逻辑。

一 “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按照最初的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从中共意识形态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一种变通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其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了《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共一大纲领即明确规定，要

^① 《杜导正日记》，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第170页。

^② 参见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于光远著、韩钢诠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访李锐：一个“社会理论”的历史命运》，载《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姚监复根据杜润生谈话整理》，《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

在中国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① 不过，人们很快意识到，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行不通。中共二大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确定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这两步革命怎么衔接，革命胜利后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问题，中共内部有过长时间讨论，但未有定论。^② 第一次在理论上明确，是 1939 年 12 月至 1940 年 1 月毛泽东先后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将不允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但也不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作为过渡。在政治上实行“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经济上，走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道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为国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将其分给农民，保存富农经济，不实行社会主义农业，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合作经济；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文化上，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所以“新”，因为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前途

① 中共一大党纲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②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彭述之、邓中夏等人，对国民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政权性质和经济形态进行了初步探讨。他们普遍认为，革命胜利后，既不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应当是资产阶级独掌政权。瞿秋白提出，应建立真正平民共和国，毛泽东称其为“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政治周报》第 4 期，1926 年 1 月 10 日），在经济上肯定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陈独秀提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要“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见《向导》第 171、193 期，1926 年 9 月 25 日、1927 年 4 月 6 日。

的。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①

1945 年，中共七大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给予进一步的肯定。《新民主主义论》认为，民主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七大则提出“需要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毛泽东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都是过虑。”^②“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当然，毛泽东所肯定的是“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他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对于中国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毛泽东没有做深入的理论阐述，只是说这种资本主义“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③

如此界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在理论上有所依归。依据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学说，社会主义不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直接建立起来。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受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影响最大。^④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直接引用了列宁《两种策略》里的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据此，他说服党内同志“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⑤毛泽东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来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不但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 65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下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1948，第 999、1001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 275、385 页。

^④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先后于 1927 年和 1929 年翻译出版。毛泽东 1932 年 4 月看到这两本书后，如获至宝。据彭德怀回忆，1933 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期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第 183 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322—323 页。

“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① 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还以俄国民粹派来指称中共党内存在的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思潮。他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② 这些论证的思想资源来自列宁。

当然，如此界定资本主义的作用，与当时提出的“联合政府”的目标有关。抗战后期，中共的力量有很大发展，足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但国民党占据着中央政府，在实力和影响力上仍然占优。国共双方随时准备在抗战后决一胜负，但一时谁也吃不掉谁。国内各阶层呼唤民主改革，渴望战后和平，担心内战爆发。国际上，出现了大国合作和政党妥协的潮流，美苏两方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依毛泽东的判断，“中国在这一次有可能成为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之中国”，这种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③ 经过长时间思考，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联合政府”并不是共产党期望的理想结局，但基于时局和力量对比，这是可以去争取的目标。从策略上说，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旨在联合各中间力量逼迫国民党开放党禁，承认各政党合法地位，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改革，争取中共在战后重建中取得主导权。事实上，也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所谓联合政府，不只是联合各中间党派，如果国共两党坐不到一起，联合政府无从谈起。为此，中共在策略上做了调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蒋介石虽然“批评九分”，但也还“留有余地”，有些话没有说透。当时，毛泽东估计，联合政府有三种前途，一是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去做官”；二是形式上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第三种前途是以共产党为中心。前两种前途都是以蒋介石为首，第三种前途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联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3页。

^③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2页。

合政府”。他说：“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不过“报告不这样写”。毛泽东对出现前两种前途是有所准备的，他甚至没有完全拒绝到国民政府做官的可能，认为这至少可以“做宣传工作”。当然，军队和解放区是绝对不交出的。^①如果联合政府能够达成，社会革命的任务推延到比较遥远的下一阶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建国构想

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最后完成，是在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这时，打败国民党已成定局，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抗战时期提出时，还是一种理论设计，为了树起一面旗帜，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现在，则是要着手制定一份即刻实行的建国纲领。因此，真正反映中共建国思想的是这一阶段的阐述。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构想，承续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基本原则，但在提法上有所变化。在政治上，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以代指“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放弃了中共六大“工农联合专政”的提法。所谓“人民”，除了原来所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外，加入了民族资产阶级，即所谓“四个朋友”。当然，“四个朋友”在人民民主专政中地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不占“主要的地位”，主体是工农，领导是工人阶级，故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一开始就排除了采用西方议会制和三权鼎立制度的可能，强调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很合适的”。^②

在经济上，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277 页。

^② 毛泽东在 1948 年 9 月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 344 页。

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与中共七大相比，区别在第二条，即没收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这在七大时是没有明确的。在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将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主要经济成分“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对这种经济形态不是放任自流。其指导原则和发展方向是：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①

以上是刘少奇 1949 年 6 月写的一段话，它集中地阐述了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这个方针有三个要点：第一，将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不只是没收官僚资本，其他带有垄断性的经济也都要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下经营。第二，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是利用与限制并用。毛泽东说：“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但不能“不受限制任其泛滥”，它将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几方面被限制。前提是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对国民生计有益而不是有害，并限定其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轨道内”生存和发展。第三，对于个体经济的政策也是两方面。毛泽东说，占整个国民经济 90% 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其经济形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个体的、分散的，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第 428 页。

但不能“任其自流”，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性质是半社会主义的。^① 毛泽东放弃了此前一度使用的新民主主义即“新资本主义”的说法，认为这个名词“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② 此时，毛泽东的政策基点是两方面：一是“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一是要“好好掌握”，引导整个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③

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到底需要存在多久呢？在 1948 年九月会议上，刘少奇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毛泽东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 15 年。”在做总结讲话时，他又说，要用一二十年时间“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④ 在 1949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⑤ 这是毛泽东较早谈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时间问题。在这一时间，高层有一个共识，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两到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比抗日战争时期的设想已经缩短了许多。^⑥ 究竟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过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1 ~ 1432 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 ~ 1949）》下卷，第 345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5 卷，第 236 页。

^④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 47 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 5 卷，第 236 页。

^⑥ 1944 年 8 月，博古在同约翰·谢伟斯谈话中说：“我们至少比世界其余大多数国家落后 200 年。我们要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到达那个状态（指社会主义）以后，才可能有希望到达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确信，它将多于 30 年或 40 年，而且可能要 100 多年。”如果这份记录准确，这是中共领袖层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一种估计。1945 年 3 月 13 日，毛泽东在同谢伟斯谈话中说：“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毛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但也认为将是长期的。见〔美〕约瑟夫·W. 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罗清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 267、264 ~ 265、328 页。